

从庚子议和看张之洞的儒臣个性

郝晏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 义和团事件是清王朝垮台之前所处理的一件最重要的政治突发事件。慈禧太后及其满族亲贵、李鸿章、张之洞成为担待这次历史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三方之中, 张之洞无疑居于核心地位。不幸的是, 张之洞的个性与信念之中存在着不可挽救的缺陷, 使他临大任而不能有大作为。通过庚子议和一事, 我们看到张之洞形象的另一面: 一个虚张声势好为大言、投机取巧不负责任的张之洞; 一个长于务虚、短于务实, 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张之洞。在关键的历史时刻, 张之洞做出的是一种自保、谄佞的选择, 既不敢对外抗争, 也不敢对内力争,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近代中国无可奈何地进一步沉沦。清政府最后虽然度过了这次政治危机, 但也耗尽了它自身的力量和人们对它的信任。随着清王朝的垮台, 张之洞个人的事业和抱负也完全付之东流。

[关键词] 张之洞; 儒臣; 庚子议和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692 (2011) 04-0041-06

公元1900年, 即中国的庚子年, 在张之洞的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该年6月开始, 中国北方陷入混乱。朝廷手足无措, 举止乖张, 致使列强各国大举入侵。京师失守, 帝后西窜。张之洞独稳坐湖北, 以一个地方督抚的身份, 操控全国政局。这是张之洞在其督抚任上, 第一次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动向发挥影响, 也是张之洞展示其政治理念、智慧和性格的最佳时机。那么, 张之洞在这一段历史, 有什么重要作为, 他又展示了什么样的理念与个性呢?

庚子事件是在中国朝廷昏聩, 大局糜烂的局面之下, 把张之洞推向历史的核心舞台的。围绕庚子事件而来的中外冲突, 把张之洞一生的政治事业推向了高峰。在这一段时间张之洞的重要作为——阻止义和团事件的蔓延, 发起东南互保, 参与《辛丑条约》谈判, 反对在俄约十一条上签字, 以及其后

向朝廷上奏的新政改革主张等等——使其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个核心。这是张之洞不仅作为一个地方督抚, 也是他一生政治事业的最高发挥和表现。此后张之洞虽然也曾入阁拜相, 但其政治作为和影响也不如这一段时间卓著。清廷官方在总结张之洞平生功绩的时候, 曾提到两点, 一是“提倡新政, 利国利民”, 二是“庚子之变, 顾全大局, 保障东南, 厥功甚伟”。张秉铎也认为: “之洞一生之事功, 于国家贡献之深且巨者, 盖为庚子拳变之坚主剿灭与东南各省之互保。斯时中国北方虽被异族联合蹂躏, 烧杀抢虏, 而江南各省得以免遭涂炭, 免于浩劫, 实之洞之功也。”^{[1] 155} 可见围绕庚子事件的作为, 在张之洞一生事业所占的分量之重。

细究张之洞在这一段时间苦心孤诣之种种表现, 我们不能不感觉, 张之洞在大局混乱之际, 确实是见识高明, 敢作敢为之人; 其关心国事, 维护民族利益之情在当时大小臣工之中也是仅有之人。但是, 张之洞的所作所为, 与国事究竟有何裨益

[收稿日期] 2011-10-23

[作者简介] 郝晏荣 (1963—), 男, 河北永年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呢,这又是一个需要认真考究的问题。

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朝廷内外对此争论不休,不知应该如何处置义和团。张之洞提出“从来邪教不可救国,乱民不能御敌”,这个认识应该说是较为切实的。为此,张之洞联络了大批地方督抚,频繁向朝上书,表达他对义和团的意见。此时此刻,在晚清的督抚群体中,李鸿章刚刚到广东任职不久,天高地远,一时难以发挥很大影响;袁世凯已就任山东巡抚,羽毛尚未丰满,处理山东一地能力有余,影响全国政局能力不足;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是地方官僚群体的前辈,但此人只有勇气而缺乏见识,关键时刻一向以张之洞之是非为是非,除此之外,其他督抚、将军、巡抚等人在地位、见识等方面皆不足论。由此可知,张之洞事实上是整个督抚群体的首领。为了义和团事件,张之洞也一再联络督抚群体,集体向朝廷施压。这些举动虽然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的力量,但张之洞在这一系列奏折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维护朝廷权威的姿态,在措辞上一改再改,致令文辞“冠冕平正”,语气委婉再三,对亲贵的颠预、慈禧的愚见,一概不敢涉及。这样的奏折,只是显示了督抚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根本不能对朝廷表现出一点压力。虽然张之洞等人表达了正确的观点,但他们软弱的语气、卑屈的态度,又给慈禧一班人以一种这些意见都可以“毋庸置疑”感觉,致使慈禧她们,照旧一意孤行胡作非为,疆臣们的正确奏议终究未为采纳,北方最后还是酿成大乱。从这一角度来看,张之洞对挽救北方局势不仅无功,而且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东南互保的策划与订约,张之洞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签署该约,也被张之洞自认为是其政治生涯中很得意的一笔。其实,东南互保之议,当时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早已在东南各省部署森严,防守周密,造就一种与北方完全不同的局势,既没有给拳民,也没有给洋人造成任何可乘之机。义和团势力因此只在北京周边蔓延,根本不可能发展到南方;列强各国既没有什么理由同时也没有更多的能力对南方各省用兵。这就使签署东南互保条约事实上成为多余。另一方面,该条约事后也没有被列强各国承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也根本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张之洞在此时,最需要做的应该是倾东南各省兵力,一齐出动,到京津一带抗击入侵中国的联军。只有在战场上展示

实力,只有拼死与侵略者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列强对中国的野心。但张之洞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结果他放弃了对整个国家的责任,而专力保护江南一隅,致使列强各国气焰嚣张,在京畿一带大肆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张之洞口口声声说:“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怒、召速祸?”^{[21] 7981}这样的说辞,仅仅是在为他拒绝派兵援助北方找借口。因为列强对中国宣战的国家虽然很多,但大多国家出兵很少,联军总兵数量也很有限。他们在中国所遇到的顽强抵抗的对手,实际只有聂士成一部。即使这样微薄的兵力,也给八国联军造成极大伤损。如果江南各省的援军及时赶到,列强联军与中国军队的交战,肯定不会占上风。由于张之洞汲汲于东南自保,拒不出兵援助北方,给侵略者留下可乘之机,遂使大局糜烂一发不可收拾。事后张之洞还为他的自保行为沾沾自喜,岂不知这种自保乃下下之策,对当时国家大局有损无益,更谈不上清廷官方所说的“厥功甚伟”。

对《辛丑条约》的签订,张之洞出谋建策很多,可惜没有一字可以被写进条约之内。唯一显示了张之洞的意见的是他对俄约十一条的主张。俄约的危害,整个清廷内外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这份条约,朝廷不甘心画押,杨儒不敢擅自画押,张之洞、刘坤一坚决主张拒签。只有李鸿章同意签约。由此,当时和今日许多人都认为,李鸿章对东北问题的处理,颇有卖国嫌疑。其实,李鸿章与张之洞对东北问题处理方式的不同,并不是爱国与卖国的差别,而是前者看重的是东北的长远利益,后者看到的是东北的眼下损失。在张之洞看来,签署俄约,等于把东北的大量利益让与俄人,这是与国家利益有损的;李鸿章则认为,东北迟早要成为列强各国争夺的焦点,今日中国出让一些利益与俄人,可以避免以后遭受更大的损失。事实正如李鸿章所担心,日本不久就发动了日俄战争,东北随后成为俄日两国共同的殖民地,东北人民也为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

围绕庚子事件的内政和外交活动中,张之洞所扮演的角色既引人注目又颇获当时及后人的赞誉。但通过我们在这里认真分析可以看到,他的言行,不是非常短见,就是空洞无聊,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实际的收益。他虽然有爱国的热忱,有为国家挽回利益的志向,但其实际作为与其主观的目标相差很远。在帝后西窜,朝廷权威丧失,国家遭受巨

大灾难的时刻，张之洞作为地方督抚的领袖人物，理应为挽救国家灾难而发挥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事实却是，尽管张之洞有清醒的见识，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却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后人赞赏张之洞的爱国之心，却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爱国只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存在，在挽救局面的败坏，在与列强的谈判争夺等等各个方面，他都没有一分正面的建树。难道张之洞的热忱是虚假的，难道这些努力是作伪的？究竟什么原因使张之洞的个人目标和努力，与其收获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张之洞本人的心理性格对此产生了什么作用呢？

二

围绕庚子事件，张之洞还有另外一层不为人注意的举动，对认识了解张之洞的个性和心理有重大意义。

由义和团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总的说来，是由慈禧太后及周围的一群满族亲贵的昏聩举止所造成。由此，事变之后，中外议论批评谴责的矛头一致指向慈禧太后等人，列强各国对慈禧的恨恨之声不绝于耳。清廷内外大臣虽然慑于慈禧的赫赫威严，对此闭口不言，但内心不是没有念头。基于这种情势，特别是有鉴于朝廷及慈禧太后的胡作非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班地方官员，颇有让慈禧太后以及她周围的满族亲贵对义和团灾难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同时也借此为朝廷的大局更张开辟一条道路。但是李鸿章的这一愿望却遭到了张之洞的强力抵制。

整个庚子事件期间，张之洞除了要为国分忧，尽可能地减少国家的损失之外，他还有一个不公开的目标，这就是要全力维护慈禧太后在这场事件中的地位，想方设法弥补慈禧的政治损失。在这一方面，张之洞真是苦心孤诣费尽心机。他的第一个观念是：为慈禧太后的罪责开脱。从义和团出场，到议和开始，张之洞对内对外一直宣扬一个说法：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各国使馆，这些决策都不是出自慈禧太后的本意。朝廷在这一段时间实际是被义和团和朝廷中的各种保守势力胁裹，不能自作主张，上述种种悖逆行为是被迫顺从了义和团等群体的要求，不能由此而责怪朝廷。

“夫以一国而敌地球各强国，攻使馆而激众怒，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我两宫圣明，岂肯出此下策？其为乱党胁迫，可想而知”^{[2] 8094}，“北方兵事，

确非两宫本意”^{[2] 8098}。其实，张之洞内心非常清楚，而且来自北方的各种消息也表明，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外国使馆等等，都是出自慈禧太后的本意，别人不会也不敢做出此等主张。但他不顾事实，只是一味为慈禧辩护。张之洞的第二个观念是：大力宣扬慈禧太后的种种善行，宣扬慈禧对维护政局的重要意义，强调他本人及全体臣民对慈禧本人的效忠。他说：“我皇太后训政三十余年，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2] 8166-8167}张之洞对慈禧的这种肉麻的吹捧和维护，引起了李鸿章及其许多大臣的不满和讪笑：“太后……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共知者。尊电一概抹杀，专咎新闻纸，似未足取信。”^{[2] 8167}张之洞的第三个观念是：把维护慈禧太后的安全和地位视为庚子善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局难料。欲存中国，总须慈圣安稳为第一义，不然中国断不能久存矣。”^{[2] 8038}联军入侵天津，北方局势危急，朝廷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张之洞却认为，“现派兵北上……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竟视整个国家的安危为无足轻重。七月二十日，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慈禧携光绪准备西逃。李鸿章闻讯，联络一大批地方官员，联衔阻止。张之洞大惊失色，称此是“万不得已出奇解悬之策”，“但未免近于莱公孤注之举”，“惊骇不安”，“万万不敢列名”^{[2] 8223}。李鸿章要求朝廷留在京城，不要望风而逃，这其中种种含义，一是朝廷留在北京，较之西逃，是对国家的一个更为负责的行为；二是朝廷留在北京，对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是一种助力，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也可以减少李鸿章本人的压力；三是朝廷留在京城，按照西方的惯例，中国则仍为有主之国，侵略者不能胡作非为，以此可以减少国家与百姓的灾难；四是朝廷留在京城，置身于与列强交涉的第一线，就必然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对其一手制造庚子灾难的一点小小的惩戒。但张之洞对这些毫不理会，他在这里却只顾及到慈禧一身的安危，只想到“两宫不出，万分危险”，毫不考虑此举对国家和百姓的益处，也丝毫不想让慈禧为国家多担负一点风险，多承担一点责任。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张之洞文中所提到的“莱公孤注”的来历。北宋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北侵,直扑澶州,威胁京城开封。宋真宗及其大臣惊慌失措,有主张逃到南京的,有主张逃到成都的。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督促真宗皇帝到前线督师。结果,宋军与辽军力战获胜,宋与辽城下议和,结成“澶渊之盟”。寇准与宋真宗的这一行为,在历史上一直倍获赞誉。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中,有一段对寇准的评价:“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1]只有当时的佞臣王钦若在事后攻击寇准,认为真宗皇帝是被寇准像赌博的孤注一样掷于澶州城下。奇怪的是,这样一种为历史所不齿的观念,竟然为张之洞所接受。张之洞与王钦若一样,也视真宗皇帝与寇准亲临前线是一个冒险的赌博行为,从而为其拒绝阻止慈禧西逃编织理由。那么,张之洞此时是不是在以佞臣王钦若自居呢?危难之际,张之洞突然冒出这样一种想法,这对于他这样一个终生以儒臣、忠臣自居的官员来说,不啻是一个极大的嘲弄。这样的论点自然会引引起李鸿章等人极大的不满,李回电称:“莱公孤注,究竟得失何如,公自有见。”^[2]

正是由于张之洞的全力救护,慈禧太后安然度过了她的生命中的一次最大的政治危机。事后,参与东南互保的英国外交人员霍必澜说:“两江和湖广总督已经声明他们自己忠于慈禧太后,并且明白说明,除非各国政府保证她本人受到尊重”,否则“他们将不能执行同各国达成的中立协议”^[3]。张之洞在庚子事件时的地位是如此重要,连列强的作为都要视其立场而定,从而不得不埋下对慈禧的报复之念。虽然国家遭受极大的创伤,慈禧仍然能够毫发无损地从西安返回北京,继续做她的太上皇。张之洞也因为自己不顾情理的效忠,从慈禧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回报。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在庚子事件中要维护国家权益的努力毫无所获,而其要维护慈禧太后地位的目标倒是完全实现了,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三

辜鸿铭在论述近代历史人物的时候,曾经有过对曾国藩与张之洞的不同评价,他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还说,“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5] 157-158把张之洞归列儒臣,这是似乎是近代以来多数人的共识。有人认为张之洞是“君子儒”^[6],有人认为张之洞是一位“很有政治个性、文化个性的儒臣”^[7] 110。而张秉铎则认为,“之洞学术以儒术为宗,以仁政为致治为政之道,以中庸勉强而行四字为行之方……之洞为学,兼师汉宋,去短取长,采精用宏,徇为满清末造首屈之儒臣。”^[11] 296-297而张之洞本人在近代历史舞台上也确实是一个明确以儒臣自居的官员,他抨击佛老,攻诮异端,捍卫儒家道统;他廉正无私,忠于国事,处处以儒臣观念自律。这在西风东渐,人心求变的近代,也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和亮点。作为一个儒臣,它的信仰和观念对张之洞在庚子事件中的决策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儒家理性主义观念使张之洞对义和团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义和团标榜“扶清灭洋”,这与清王朝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层关系,清王朝的很多官员视义和团为“义民”,要求朝廷明确支持义和团,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列强。但张之洞从儒家理性主义观念出发,认定义和团只会给国家带来祸乱,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效益。他称义和团为“邪教”、“乱民”,完全不考虑义和团的反侵略的意义,也是由于其儒家理性主义意识与义和团的巫术、迷信观念相对立而自然得出的结论。

第二,儒家的国家意识与民本主义观念使张之洞极力抵制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张之洞为官一生,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直极为敏感,任何权益的丧失,他都极力争夺。围绕庚子条约的谈判,张之洞极尽所能,尽可能地为国家挽回一点权益。与李鸿章在谈判时所抱有的中国是肇事之国,事后理所应当接受列强的处罚的态度不同,张之洞认定夷狄之国,其心必异。不论其要求为何,只是以抗争为手段,以拒绝为原则。

第三,儒家理想主义观念使张之洞在庚子议和的艰难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自强和改革。改革和自强是张之洞后半生的主要追求,也是其儒家儒家理想主义观念的现实体现。与其他官员苟且偷活,只想度过庚子难关的想法不同,张之洞在庚子议和的艰难时节还念念不忘改革,还一心要为清王朝日后的自强留下一条出路。这是其参与所有谈判交涉必

须坚守的底线,也是其苦心孤诣与列强抗争的心理支柱。正是这种追求和抱负,使张之洞在议和尚未进行之际,在夏季炎热的武昌于挥汗如雨之中写下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朝廷随后的新政改革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蓝本。

在各种场合和不同的环境,张之洞都有一种自觉的意识,捍卫儒家的道统保持儒臣的本色。但是,张之洞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坚守的儒家观念乃是一种扭曲的立场,距真正的儒家观念原则有很远的距离。原因在于,首先,儒家思想与官僚集团是完全不同的符号体系,尽管两者在历史上一直相互依存相互维持,但它们的原则性的区别还是客观存在。由此,一个人无论他有何等才能,都不能完美成功地扮演儒和臣这两种角色。在历史上,有成就的儒家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或被放逐者;而成功的官僚,从萧何、诸葛亮到张居正、曾国藩等等,他们都没有以儒臣自居,既没有背负儒家道统的责任,也不受其道德观念的约束,更没有主动弘扬儒家文化理念的自我要求,他们都是以儒为名,或者综合儒、墨、法、道,择其可用者而用之,一句话,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观念上的实用主义者。其次,清王朝建立之后,由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高压的文化政策和歧视性的政治压力,儒家传统的精神内核已被剥离,所残存的仅是以八股为支撑的儒家体系的外壳和形式而已。张之洞所要捍卫的儒学以及所引以为行为指南的儒家原则,都是一些外在的教条,而不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由此,张之洞在坚守儒家立场的同时,又对其做了极大的扭曲。比如,儒家观念中包含强烈的反对专制、挑战权威的意识,儒家传统强调“从道不从君”,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9]但是,这种挑战权威的意识,在张之洞这里无力被正面发挥,却被转化成为对列强强权观念的反抗。有关对外交涉事宜,张之洞一概以有损国家主权的理由拒绝。爱国的观念,被儒臣的责任和信念意识所扩张,显得更加膨胀有力。再比如,社稷与国家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是终极性的关怀与超越性的托付的双重寓寄。臣子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是不容推卸更不容怀疑的。但是在张之洞这里,对国家的忠诚观念却被扭曲为对慈禧太后个人的效忠,在很多关键场合,张之洞都出面为慈禧个人的行径辩护。对慈禧个人的维护与效忠

在张之洞在政治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

既要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又要维护慈禧太后一班人的无上权威,这实际是张之洞为官的主要信条之一;前者主要体现在张之洞的标榜上,后者则表现在张之洞的行为上。大部分时候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也有的时候,比如我们本文所讨论的庚子事件中有关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的争论,就体现了国家利益与慈禧太后个人利益的强烈冲突:如果为了国家着想,就应该把慈禧太后留在北京;如果为慈禧太后个人考虑,就要让慈禧逃离京城。对于张之洞来说,则有两个选择:是像孟子所坚持的国家利益高于君王利益呢,还是像王若钦所做的那样把君主得失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是做一个彻底的忧国忧民的忠臣,还是做一个为了一己之私而曲意投君王所好的佞臣呢?事实表明,在关键的时刻,张之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再加上之前张之洞对义和团事件的处理方法的错误、东南互保的糟糕的决策等,只能使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挽回。

在晚清诸重臣中,张之洞是唯一官僚生涯较为清白的一个。由于历史的机遇或者朝廷的特意安排,张之洞从没有被派到政治或战争冲突的第一线,这使他得以避免许多被苛刻评价的场合。在近代历史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舞台上,张之洞却呈现给人一种少有的纯粹面目,他没有贪污腐败,没有镇压农民起义,没有与革命党为敌,没有签署屈辱的外交条约;从任职山西、广东,到湖广再到两江,他都留有很好的政声和业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曾经对张之洞留下很高的赞语。但是,参与庚子议和一事,却为我们呈现张之洞形象的另一面:一个虚张声势好为大言、投机取巧不负责任的张之洞;一个长于务虚、短于务实,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张之洞。如果张之洞在义和团事件期间表现的更有勇气,更有责任感,更有现实的判断力,清王朝在庚子事件中的历史结局是不会这样糟糕的。不幸的是,关键的时刻,张之洞做出的是一种自保、谄佞的选择,既不敢对外抗争,也不敢对内力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近代中国无可奈何地进一步沉沦。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把张之洞定性为国家佞臣、慈禧的奴才。但不能否认的是,张之洞作为晚清最重要的儒臣,他的标榜与他的实际行为之间确实有很大的距离。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士人与官僚、忠臣与奴才、佞幸与大儒等双重角色与个性的矛盾和冲突。他的内在性格及其为官信条,

有深刻的自我矛盾和二重性。深知张之洞个性的徐致祥曾经严厉地弹劾张之洞,另一位了解张之洞为人的刘坤一曾经用“遇小事勇,遇大事怯”和“公忠如香帅,并世能有几人?”^{[2] 8488}等这样完全不同评语来概括张之洞的个性。而张之洞本人也挣扎在这两种个性与理念之间:一方面渴望立德、立言、立功,成为名垂史册的“三不朽”,另一方面又巧言令色、规避风险、不敢承担责任;他声称最敬慕的历史人物是范仲淹,但在现实中,人们却批评他首鼠两端,观望苟且,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应该说,这两种完全不同理念、个性与形象的张之洞都是真实的。在平时,一种形象掩盖了另一种形象;只是在庚子事件这一关键时刻,张之洞的这两种理念与个性才一同呈现给世人。

义和团事件是清王朝垮台之前所处理的一件最重要的政治突发事件。在这次事变中,昏聩颟顸的慈禧太后及其满族亲贵,年迈力衰固执己见的李鸿章,还有虽然头脑清醒但胆小怕事,不敢承担责任的张之洞,成为担待这次历史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三方之中,张之洞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以张

之洞平生的抱负以及当时他所具备的实力,他是能够把这一难题处理得更加妥帖的。不幸的是,张之洞的个性与信念之中存在着不可挽救的缺陷,使他临大任而不能有大作为。清政府最后虽然度过了这次政治危机,但也耗尽了它自身的力量和人们对它的信任。随着清王朝的垮台,张之洞个人的事业和抱负也完全付之东流。这无论对张之洞本人还是对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免是一个悲剧。

[参考文献]

- [1] 张秉铎. 张之洞评传 [M]. 台湾中华书局, 1972.
- [2] 张之洞全集: 第十册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3] 范文正公集·卷八 [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4] 胡滨.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2.
- [5] 辜鸿铭. 请流传 [M]. 语桥,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 [6] 彭卫民. 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6).
- [7] 皮明麻. 儒臣官品与洋务心态 [M]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8] 鲁穆公问子思 [M] //郭店楚墓竹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整理本, 1998.

(上接第 40 页)

[参考文献]

- [1]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 万木草堂口说·诸子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4] 万木草堂口说·荀子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5] 万木草堂口说·礼运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6] 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7] 《孟子微》序 [M] //康有为全集: 第五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8] 万木草堂讲义·七月初三夜讲源流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9] 万木草堂口说·孟荀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万木草堂讲义·七月初三夜讲源流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万木草堂口说·诸子(二) [M] //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 [12] 万木草堂口说·中庸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孟子微 [M] //康有为全集: 第五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4] 南海师承记·讲孝弟任恤宣教同体饥溺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5] 南海康先生传 [M] //梁启超全集: 第一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16] 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7] 南海师承记·讲变化气质检摄威仪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8] 南海师承记·讲格物 [M] //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